



寸草春晖

无声的爱

□邱玲娜

农场裁缝店里,我取回改好的裤子,刚欲离开,那位阿姨怯怯地唤住了我。她搓着衣角,神情窘迫,嗫嚅着说想请我帮忙充燃气费,说她丈夫卧病在楼上,家中燃气早已断了一周,这些天,她只能用电磁炉烧菜,想给丈夫炖只鸡汤也成了奢望。

我望着阿姨枯槁的手微微发颤,那嶙峋的指节和深嵌的皱纹,像是被岁月抽干了水分的老树根。这景象猛地刺中了我,不由得想起昨天手机亮起时父亲发来的那条信息。

父亲素来寡言,尤其对我。日常联系近乎吝啬,不过是偶尔转发条养生文章,惜字如金。可那条信息,字里行间却浸满了从未有过的疲惫与酸楚。他是牙医,絮絮地说:每天天不亮就跨上旧电瓶车,风里雨里在两个诊所间奔波。那天中午,父亲胃里突然翻江倒海,绞痛伴着呕吐袭来,他只得蜷在诊所角落,勉强喝点温热的冬瓜汤压着。“风寒像是钻进骨头缝里了,一阵阵发冷,连头顶吊扇那点微弱的风都受不了。”信息最后,是一声沉沉的喟叹,仿佛从肺腑深处艰难挤出:“年已花甲,为何还要这般辛苦?”字字句句,都像刀子割在我心上。

下午,母亲的电话更添焦灼:父亲高烧浑身滚烫,人已在急诊室挂水。我冲到医院,只见他孤零零地坐在冰凉的椅子上,那件常穿的白大褂罩着他,更衬出身形的瘦削佝偻。我急得直跺脚,怨责他们这把年纪不该如此拼命。母亲却催我回去吃饭、陪孩子,说她在就好。可他们自己,分明也粒米未进。那一刻,我骤然明白:父母那一辈人,生命烛火其实早已悄然摇曳至烛芯根部,烛泪斑驳,光亮渐微。即便如此,他们依然固执地、无声地燃烧着,用那残存的光与热,努力照亮儿女的世界,映照出人间最深沉的牵挂。

父亲口才其实甚好,宴席上常谈笑风生,偶尔也替亲朋主持。唯独面对我,总显得沉默寡言。我曾暗自揣度他是否偏爱妹妹。直到听闻大学同学谈起,我婚礼上父亲牵我上台时眼中含泪,才惊觉父爱如静水深流,无声处亦有惊雷。我的确是父母宠大的孩子,他们从不肯让我染指锅灶。父亲至今仍说:“她会什么呀,不用她做!”邻居皆知我是“懒姑娘”,而我心底却溢满被娇宠的幸福。

四年前外婆回东北老家后,他们更忧心我们的三餐。常常在傍晚时分,骑着小电驴匆匆赶来我们县城的家。待我下班回家,桌上总有热腾腾的饭菜。因次日还要奔波于两个诊所,无论多晚,他们从不留宿,必定赶回家去。风尘仆仆来去间,那双曾托举我童年的手,又在我们小家里的灶台前忙碌开来,将一日日的牵挂与叮咛,细细揉进了饭菜的烟火气里,无声无息。

正想着,母亲电话来了,说家里有一条野生大黑鱼,傍晚拎来给我们炖鱼汤喝。

热汤雾气缭绕之中,我窥见了父母无言深沉的爱,也望见了裁缝店夫妇相濡以沫的深情。世上的父母大抵如此吧?他们正步入暮年,却依然固执地踮起脚尖,试图为我们遮挡岁月的风霜。那碗汤的暖意,正是无声的叮咛:趁着灶火未熄,汤尚温热,我们该多回去看看了。毕竟人间至味是团圆,莫待思念成霜、遗憾如刺,才想起炉上那碗父母守着时辰、煨着心意,为你热了又热的汤。

汤要趁热喝,爱亦如是。

时光记忆

母亲

□韩楚

提笔写这篇短文时,母亲已经离开我们5年了。

母亲年轻时当过小学老师。后来因为要操持家务,渐渐放下了教鞭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姐弟三人后来的求学之路。

母亲勤劳善良,与左邻右舍都相处得很好。在田间地头,更是一把好手,插秧割稻、种瓜点豆样样在行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,家里曾与邻居两户人家一起承包过队里的小窑厂,她小小的身躯和几个壮年男子一样,在烈日下起早贪黑弯腰脱砖坯,肩膀被扁担磨出血痕也要咬牙坚持把一担担砖坯挑上窑。她总是说:“我是老党员,不能让人看笑话。”就这样,她以惊人的毅力帮家里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。放暑假的两个月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,也是我替她帮忙的日子。我和邻居们在一起劳动、一起躺在砖坯场地休息。从母亲肩头的五码砖,到我肩上的七码砖,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成了我最深的记忆。

母亲是位老党员,比父亲党龄还长。每年农村冬训班开党员大会时,她总是被点名发言。不是因为她能说会道,而是因为她说的话“实事求是、不做作”。记得有一次,她当着全村党员的面说:“我们农村党员带头,不是靠嘴上喊口号,而是要实打实地干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了村里的名言。每个月交党费时,母亲总是提醒父亲:“乃标,记得把我的那份也交了。”

母亲是个识大体之人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父亲长期在村组担任生产队长、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,村里打架拌嘴、婆媳争执、夫妻矛盾是常有的事。每当村民闹得不可开交,总有人跑到我家来评理。母亲从不嫌烦,总是先请人坐下来,倒碗热水,等对方气消了些,再慢慢劝解。她和父亲一个唱红脸,一个唱白脸——父亲讲原则、论对错,母亲则温言细语,劝双方各退一步。她常说:“事情弄清楚就好了,日子还得往前过。”很多时候,当事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地来,却在我家吃过饭后,心平气和地离开。

母亲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家人。20世纪90年代后,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在市区安了家。每次回老家,天还没亮就能听见她和父亲在厨房忙碌的声音。一大桌子菜还嫌不够,生怕我们吃不好吃不饱。经常会歉意地说道:“煮饭蒸咸菜,忙煞老奶奶。”临走时还要给我们准备大包小包,后备箱总是被塞得满满当当:新碾的米、自家种的蔬菜、现榨的菜籽油、腌好的茼蒿干……孙辈出生后,母亲的大本营从乡下移到了盐城市区。把大孙子带到了上幼儿园,又把小孙子带到了初中毕业。

母亲晕车严重,这辈子没出过远门,连县城东坎都很少出,最远只到过盐城市区。七十岁那年,她患上了类风湿病,手指关节肿得像小馒头,走路时需要拄着拐杖慢慢挪步,行动越发不便。可就是这样,当2019年她得知我们搬了新家,她硬是克服了极大的心理障碍,在“五一”节后和父亲一起来杭州看我们。一路上,她吐了又吐,胆汁都快吐出来了,脸色煞白,却还是坚持到了杭州。“儿啊,妈妈这一趟来得不容易啊。”她虚弱地笑着说,“不是你们搬到这里,我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西湖。看到你们过得有出息,我就放心了。”

这些年来,因为工作上的事忙忙碌碌,我很少做梦,更少梦见母亲。没想到今天,在我生日这天梦到了她——都说儿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,或许是她也在惦念我吧。

母亲没留下什么值钱的物件,可她那句“党员就要实打实地干”,还有扁担磨出的老茧,早成了我们家的传家宝。

愿母亲在天堂一切安好。

夕阳红

长椅上的“移动课堂”

□明坤

退休教师王老师拎着旧布袋往长椅上一坐,长椅就成了小小的“移动课堂”。他的布袋里装着故事书、几截粉笔头、一副象棋,还有些零碎纸片。放学铃响过不久,几个小脑袋试探着从花坛后冒出来,像怯生生的小鸟。

起初是没人敢靠近的。王老师也不急,掏出一本书自顾自地念,声音不高不低,恰好能飘过冬青丛。念到“孙悟空拔根毫毛”,他自己先“扑哧”乐了。这一笑,花坛后也传来“咯咯”几声。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先挪出来,接着是戴眼镜的小男孩,最后那个拖着鼻涕、书包带子掉一半的调皮鬼小虎,也磨磨蹭蹭蹭到了长椅边。

王老师的故事像有魔力。他讲三打白骨精,手里粉笔头往地上一画,就是金箍棒横扫千军;讲曹冲称象,顺手捡起几片落叶,便是大象与石头。孩子们脖子越伸越长,眼珠瞪得溜圆,连小虎也忘了擦鼻涕。故事收尾,王老师合上书说:“明天看谁能猜出这孙猴子后来咋样了?”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追问,他摆摆手,只把布袋里的象棋掏出来:“来,谁先摆好棋盘,谁先听秘密。”

日子久了,这长椅边的光景就变了。故事讲完,王老师会变出点别的,粉笔头在地上写几个字,教他们认;棋盘摊开,教小虎“马走日”;有时是几张彩纸,三两下折出会蹦的青蛙。孩子们围着他,像围着个热气腾腾的暖炉。作业本摊在膝头,铅笔沙沙响。有孩子计算题卡了壳,小脸皱成一团。王老师也不直说,只拿粉笔在地上画几条线:“喏,你家的糖罐子,昨天五颗糖,妈妈今天放进去三颗,你放学吃了一颗,罐子里还剩几颗糖?”孩子眼睛一亮,埋头刷刷写起来。

起初有家长不放心。李婶远远瞄着,生怕这老头儿拐带娃娃。直到有天小虎举着张歪歪扭扭的满分听写纸冲回家,李婶才惊得不拢嘴。张伯也发现自家那个“闷葫芦”孙子,竟天天回来念叨“王爷爷说”。家长们心里那点疑虑,渐渐被风吹散了。有时傍晚来接孩子,见王老师正教娃娃们用草茎编蚂蚱,夕阳的金粉落满他稀疏的白发和孩子们专注的头顶,那画面有种说不出的安稳。

小花园的花开了又谢。王老师的长椅,成了小区一道无声的风景。那旧布袋像哆啦A梦的口袋,总能掏出新鲜玩意儿,也掏出孩子们眼睛里的光。

秋风起,地上落叶金黄。孩子们围着王老师,听他用落叶讲小虫子的过冬故事。风有些凉了,王老师找了找旧外套。李婶抱着件厚毛衣匆匆赶来,不由分说披在他身上,说:“您老可得多穿点,咱这儿的小树苗,还指着您这片老树荫呢!”王老师一愣,眼角细细的皱纹里漾开暖意,像被秋阳熨帖了。

长椅依旧沉默,木纹里嵌进了粉笔灰、草屑和孩子们的笑语。王老师坐在那里,头发像粉笔灰一样白。他把布袋里积攒了几十年的光阴碎片,轻轻摊在夕阳里,任由孩子们的小手挑拣。这点点滴滴的暖意,让这寻常长椅生了根,成了小区心照不宣的“灯塔”。